

---

#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

## ——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涂戈尔<sup>1</sup>

**【摘要】**：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 18—19 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关键词】**：罗威廉 汉口 冲击与反应 内在理路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7-0110-07

汉口起源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明万历四十年，汉口人口仅 8515 人，经过明末清初的发展，至清代中叶已发展成为“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重，船舶数千万”的大城市。“1465 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 年升格为镇，此后常设为镇。19 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 100 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分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sup>1</sup>地方志书如是描绘清初汉口繁华盛况：“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sup>2</sup>“上至硤口，下至接官厅计一十五里，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其外滨江，舳舻相引，数十里帆樯林立，舟中为市，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所需于湖北者，如山陕需武昌之茶，苏湖仰荆襄之米，桐油墨烟下资江浙，杉木烟叶运行北直，亦皆于此取给焉”。<sup>3</sup>独特的商业功能，非行政中心的城市性质以及商业文化的浸润渗透，使得汉口在传统城市体系中卓尔不群，颇为另类：非政治中心的商业码头城市和“转输贸易”商业形态；城市功能的商业性而非政治性，城市布局自然生长而非事先规划，有利于商业展开而非以官衙为中心；城市居民和社会结构以商人市民为主体而非官僚士绅占统治地位；城市治理是自治的而非官治的，城市经济是商业的、市场的而非农业的官方垄断的；城市文化是流动、包容、开放、世俗而非固定、保守、封闭、正统的等等。

汉口的这种特殊地位，历来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在对中国都市的个案解剖中，名列首位的便是汉口。他认为汉口作为一个巨大都市，无论是城市面积、人口还是影响力，不仅在新兴工商市镇中鹤立鸡群，而且相较于武昌和汉阳传统郡县城市也是后来居上，“在三市构成的组合中，汉口不仅超越汉阳县(元代为‘府’)，还超越武昌成为实际上的大集散地，得益于前述的天时地利。由于发展过快变得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汉口相比一般的贸易港(商埠)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且在资历上可算作香港的前辈。换一角度看，在武昌也有一定的工商业者，与以这些人为主体形成汉口市民的速度相比，则现实的发展速度过快。而外来人才迅速地大量聚集于此地，由此构筑了多元的都市”。<sup>4</sup>也正是由于汉口的加入，使得武汉这个组合型城市的城市地位大大提升，“尽管如此，让武汉整体跨入超级巨大都市行列的就是三者之中最有实力的汉口镇”。<sup>4</sup>

海外城市史学者关注汉口城市研究最典型者当推美国汉学家罗威廉，他有两部研究汉口的著作，即《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

---

**作者简介**：涂戈尔，江汉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56。

---

商业与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罗威廉对汉口的商业功能和城市地位给予很高评价：“前工业化时期高效率的水运系统和特殊的商业手段，使中国克服了长距离、低技术的障碍，并在清朝中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即使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这样的发展也只有有在蒸汽动力运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说中国国内市场有一个唯一集散中心的话，它就应当是汉口，它完全称得上是一个‘中心都会’”。<sup>5</sup>罗威廉对18—19世纪汉口的研究，没有流于一般的历史描述和局限于某一个案城市，而是通过对汉口城市商业与社会的深入解剖，回应海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关切，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进而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中国一些城市如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新的学术话语体系。

## 一、汉口具有自身内在发展路径

西方学界主流观念认为前近代的中国一直停滞不前。费正清认为，由于缺乏内在动力机制，传统中国依靠自身很难突破旧的框架迈向现代，只是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剧变，开始向现代社会演进。“西方能够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现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他认为，“要理解近代中国，必须将其置于中西接触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探究这种新力量的滥觞与壮大，也要以百年来的西方影响为背景。民族主义、一党执政、人民至上、技术崇拜、青年主导、妇女解放——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源自同西方的接触”。<sup>6</sup>在近代中国，虽然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是缓慢而渐进的，但总体的趋势是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觉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sup>7</sup>

将“冲击—反应”模式应用到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便使绝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也是在“冲击—反应”的模式下展开的。“中国城市在功能与结构方面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人的影响才迫使它开始出现了某些变化”。<sup>8</sup>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罗威廉一反成说，管中窥豹，以18世纪至19世纪90年代之前汉口城市发展历史实例，对此提出了新的阐释。

汉口从15世纪建立到19世纪末的迅速发展，是一个与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相反的例证。伊懋可认为：“1300年至1900年间发生的许多事实，似乎表明大城市已自行停止发展或出现倒退的趋势”。汉口的发展历程，不管它怎样不够典型，仍然证明了中国具有不断产生新的第一流城市的能力，在那里，地理和商业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汉口的发展历程反驳了罗兹·墨菲在1954年发表的关于西方冲击论文中所作的断言及其隐含的假设：“在官僚主义的中国，单靠贸易是无法与作为城市基础的行政体系对抗的。像汉口这样优越的贸易场所……在欧洲商人那里建立起主要的城市之前，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汉口的存在证明，在中华帝国晚期，“仅仅是贸易”也能够支持与当时西方拥有的最大的城市一样大的城市。毫无疑问，西方势力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为汉口在太平天国后迅速地恢复其人口规模做出了贡献(虽然19世纪60年代中期完全由中国人主动修筑的汉口城墙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然而，最为关键的事实却是1856—1889年间汉口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属于返乡人口。即使有了新的对外贸易机会，在取得通商口岸的地位几乎30年后，汉口的人口规模仍然未能恢复到太平天国攻陷前“汉口镇”全盛时期的水平。因此，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的汉口不可能是由“欧洲商人”在清代汉口的位置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sup>9</sup>

罗威廉认为，即使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西方对汉口的影响亦甚微。“19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停滞的，也不是冷漠地等待着外来刺激的震动，然后才做出反应或仿效外国模式”。<sup>10</sup>“汉口引人注目的地区间贸易量和贸易范围在鸦片战争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且甚至在汉口开放之后仍然是它最具生命力的一个方面。正是汉口之全国性突出地位的建立，而不是西方的影响，使它逐步摆脱了地方商业体系之中心城市的地位。这种转变是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全国性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sup>5</sup> “在这个通商口岸开放的最初三十年中，西方的出现并没有显著地改变汉口社会历史的进程。1861年以前，外国人在这里已为人们所知，尽管他们的人数后来增加了，但仍然非常之少，而且与当地居民严格地隔绝开来(主要是出于外国人的选择)。由于这种孤立的隔绝状态实际上是外国人在经商过程中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就显得更为引人注目。进而言之，1890年以前，外国的直接影响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内。”<sup>5</sup> 这些影响主要在三个领域，“即商业融资、商品内部的相对构成以及商业技术(特别是在运输方面)等领域”。

在金融领域，“按照西方模式组织的所谓‘现代银行’很早就被引进到汉口了，而且在不久就成为主流”。<sup>5</sup> 但是，即使在汉口开埠后的30多年里，“商业金融业务的绝大部分仍掌握在中国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手中，并按照传统的中国方式运营着”。<sup>5</sup> “在运输技术方面，西方也带来了重要且颇为复杂的变化”，“轮船逐步取代了在汉口开埠最初几年里西方商人用来从事上海—汉口间贸易而包租的三桅帆船。在国内贸易方面，轮船也因为速度较快，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运输那些不易保存的货物”。另外，“轮船被引入中国内河航运的主要意义之一是刺激了中国仿造轮船”。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乃至中国的运输技术仍然以帆船为主导，“轮船运输严重影响了三桅帆船的生意，但对平底帆船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事实上长江上的平底帆船比其他船有较多的获利机会，因为它们不仅被雇来运载日益增多的进口货物，还被用来运送由轮船运来的国内产品。……由此看来，轮船不仅没有取代、反而加强了汉口传统的国内帆船贸易”。<sup>5</sup>

因此，罗威廉强调，对于19世纪汉口开埠后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力机制要做具体分析，“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这些变化何者可直接归功于与西方的接触，而何者则是其内在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虽然开埠后因为外贸的因素汉口的商业有了加速的发展，“但它的发展毕竟远远早于对外贸易。在1889年中国开始引进蒸汽动力工业之前，这一内在发展的结果看来要比(西方势力的到来所引起的)变化重要得多。”<sup>5</sup> 罗威廉进而指出，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和对外开埠，按照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的发展惯性，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进化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关于19世纪的中国已出现实质上的城市自治的观点，也意味着两种可能性的选择：(1)中国将沿着自身的发展道路，最终发展到可与西方相比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2)如果中国没有像这样发展，其原因也不会是由于这些城市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从而未能充分发挥其必需的催化作用，而只能在其他方面寻找原因。”

当然，在近代汉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罗威廉并不否认西方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在19世纪末期才开始显现。“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本项研究所涉及的时段之后。对于汉口，我将讨论的是清代汉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特点，以及这种结构在19世纪经历的渐变进程，并最终导致它直接进入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革命和1911年的政治革命(武汉是中国最早经历这些激进事件的地方)。当然，外国干预与外来因素地发挥了作用。工业化技术全部是引进的，而且是由专制官僚机构(张之洞)和外国企业主持的。”“从1890年到1910年的20年时间里，是当地商业的一个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在中日战争和工业化影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掠夺，西方人才逐渐真正取得了他们寻求已久的、在汉口贸易中的控制地位。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贯通了汉口，汉口的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份当时的资料报告说：从1867年到1916年，汉口的年度外贸额增加了两倍(从6900万两增加到2.002亿两)；另一些报告说，这些年中的增长幅度要更大一些。随着贸易的扩展，到汉口来的外国人显有增加之势。1895年，英租界与俄租界连接起来，这一年晚些时候，与德租界、1898年与法租界相继连成一片。同样在1898年，日本人也首次在汉口建立了租界，并且在随后的七年中他们将租界扩大了近一倍。这样，在这一时期，几个世纪以来汉口的老商业传统遂几乎完全被外来势力征服了”。<sup>5</sup>

尽管如此，罗威廉仍然认为，由于城市的功能特性和历史发展惯性，汉口是有可能进入到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的，西方影响只是历史的偶然。“虽然这些外在因素也非常重要，但本项研究清晰地表明：这个城市本身的条件使它有可能——或许是必然——成为中国工业与政治革命的全国性领导者。而汉口19世纪的总体历程，就表现为这些事件的漫长序曲”。<sup>5</sup>

## 二、汉口是典型商业经济型城市

如果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念，城市必须具备超出行政首府功能即“在贸易—商业关系中显示出相对的优势”的所谓“韦伯模式”来衡量，中国古代可以说基本没有城市。“在中国，是否为官吏的驻所是城市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而

且城市也是依照官吏的等级来分类的。”<sup>8</sup>“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的治所”。<sup>8</sup>中国古代城市当然也有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但韦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一是受到官府的严格管控，只是政治军事功能的附属物，“城市的繁荣并不主要有赖于市民在经济与政治冒险方面的进取精神，而更在赖于朝廷的管理职能，特别是对江河的管理”。<sup>8</sup>二是具有典型的消费城市特征，“所谓‘君侯城市’指的是，城市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宫廷及其他大家族的购买力维生，此种城市类型相似于另外一些城市，定居在那儿的工匠及其商人的经济机会主要也得看城里大消费者——即‘坐食者’（Rentner）——的购买力而定”。<sup>8</sup>

对于这种以西方城市为标准来评判中国传统城市的所谓“韦伯模式”，罗威廉以为，这一模式漠视各种类型的中国城市中城市功能的差别，尽管古代中国城市的主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另外的事实是，传统中国也存在一些诸如景德镇（瓷器生产）和汉口（水运交通贸易）这样的专业化经济功能城市。“汉口的发展历程，不管它怎样不够典型，仍然证明了中国经济具有不断产生新的第一流城市的能力，在那里，地理和商业因素起着主导作用。”<sup>5</sup>罗威廉甚至极而言之：“汉口存在的理由是贸易，一种特殊型的贸易：它是货物转运中心，并通过市场机制对国内物质的流通进行宏观上的调控与管理。一部清初的中国商业指南把汉口说成是‘整个清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sup>5</sup>汉口的这种独特的商业地位，既得益于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也是传统中国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韦伯等西方中心论者眼中，传统中国城市在官僚体制的制约下，效率低下，封闭保守，市场无序等弊端丛生，但所有这些在汉口都很难看到。“虽然在汉口商业的内部，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控制与自我调节，但19世纪的汉口仍得以保持为一个著名的自由运转的市场。贸易受到严密的监督，但从未被彻底控制。江湖骗子、纨绔子弟与街市混混儿在这个城市都很活跃。可是，西方著作中通常描绘的中国城市（或‘前工业化城市’）的种种陋习和效率低下，在汉口却很少表现出来。以原始的讨价还价代替理性的市场控制机制，在贸易伙伴的关系上持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态度，不合适的贮藏方式和贮藏设备，以及缺乏马克思·韦伯赋予城市的‘契约自治’的特征，等等，似乎没有一条完全适用于中华帝国晚期像汉口市场所显示出来的大宗批发贸易方面。”由此进一步观察，罗威廉认为，19世纪汉口的商业贸易已经具备韦伯们说的“理性经济”：“所有各式各样书面的商业协议，从船运协议（‘船票’）货运单（‘保单’‘清单’），到各种凭据（‘凭票’‘借据’）的交易契约（‘定单’‘成单’），都在汉口正常地通行流转。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城市如此庞大的贸易是无法想象的。商人们与行会在质量控制方面的一致努力，恰恰证明他们并非忽视‘市场理性’，而是对它抱有一种依赖感。韦伯曾把‘理性经济’定义为‘一种功能性组织它源于人们在市场的利益争夺的货币价格相适应’。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19世纪的汉口经济完全适合韦伯所说的‘理性经济’”。<sup>5</sup>罗威廉从资本的普及化及其精巧的运用、投资合伙人制度以有限责任制，“中人”作为商业交易的保证人和仲裁人在维持有秩序的市场中所起的理性作用、汉口商界存在的普遍承认的商业规范与共同准则、行会组织主导和管理汉口商业交易使市场竞争规范化和有序化等等，系统论述前近代时期汉口商业社会的这种“理性经济”。成书于民国初年的《汉口小志》就曾提供了汉口曾经具有的“普遍承认的商业规范与共同准则”：

汉口交易习惯为中国极复杂之一部，盖由商业之种类或国籍之异同所生，又或由各个信用之程度以异，其交易习惯因而不能一律，兹就一般交易上习惯说明如左：

甲、货物之买卖决定。一般虽交换交单、定单、成单以为约定之证据，然由买卖之大小信用如何，或为口头及账簿上之约束而不一定，关于秤平及支付期日，豫宜质之对手，然后以为约束。

乙、货物之交付。虽当约定之时以为决定，然一般习惯由卖主送至于买主指定之场所，其通例也。若指定为堆栈时，则送运费归买主任之。其他如交付之时期，当以随时为决定。

丙、价银之支付。一般定于契约之初者，虽以十日二十日或一礼拜后二礼拜后皆不一致，凡属长期者，当于其期间给付以市场普通之日息，唯与外国人交易而涉于长期者，不仅缺交易之敏活两造以危险甚多，故普通为二礼拜，独中国商人于彼等之会馆公所为严重之制裁，斯患甚少，故涉于是期为多。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契约”的规范和约束，汉口这样一个庞大的商品市场体系将会如何运转。所以，罗威廉说“19世纪的汉口经济完全适合韦伯所说的‘理性经济’”。而且，在汉口市场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商业行业组织。这些行业组织制订商业交易规则，进行商业中介和仲裁，调解商业纠纷，维持市场秩序，在推动汉口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充当极为关键的角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口行业组织对商业经营活动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定规则以规范市场交易活动，“汉皋地方辽阔，商贩辐辏，各业皆有帮口，有会馆，既可以议规整条，复可以敦睦乡谊，两有裨益，故官宪亦不之禁”<sup>9</sup>。如汉口米市公所就于1678年拟定章程，规范米市交易：“吾等莞汉镇米市，以米牙为业。若无公同集会之所，则无以商定行规，必致众议相异，轻重不一，将违吾等之初愿，以米谷为民食所依之故也。若轻重且不一，何以明吾等为公之心，复何以卫吾行之诚信，故集同业之众于兹，以划一交易，且重申行规”<sup>10</sup>。“药帮”的“怀庆会馆”在广泛征求药材商人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药材行业经营规范，“共同草拟了一份面向全行业的规则（行规）。除了陈述一般性原则之外，他们还按照药材的地域来源，确定了一份汉口药材行业的34种主要药材贸易的清单（迄今仍保存着）。清单上的每一种都有十一款标准来规范其贸易，要求所有汉口药材商人遵守。这些标准包括药材交易的容器类型（例如，木箱）、销售单元的大致重量以及所允许的误差比，以及付款时银两的成色。规则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每宗交易中买主支付款、卖主获得款、牙人佣金以及货物运送过程中的损耗等各自所占的比重”<sup>5</sup>。他如茶叶公所对茶叶交易也有严格的行业规范。二是管理商业经营活动和维持市场秩序，主要包括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确定市场价格防止无序竞争，规范市场行为和维护商业道德等等。如“铜器公所一直坚持1879年制定的规章：在汉口，只有属于铜器公所并经过它授权的商店才能生产并出售铜制的管乐器；天平公所则规定其所属工匠不得在任何未经公所特别授权的地方经营衡器”<sup>5</sup>。市场价格的合理与稳定，既能在保护商家利益的前提下防止恶性竞争，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保持市场的持续繁荣。三是协调商人和政府关系，调解和仲裁商业冲突。总体上看，清代汉口的官商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汉口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稳定，一直支持会馆、公所等商业组织开展工作，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维护彼此利益方面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在商会与官府之间的博弈中，商会虽然承受了许多压力，但在争取商人权益，维护市场繁荣方面仍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因为在地方官府看来，大部分行会都是支持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所以它们积极支持行会制定自己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及仲裁行会成员与非行会成员之间发生的商业纠纷”<sup>5</sup>。

罗威廉指出，如果沿着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商业资本投资工业的可能性是大有可能的，一个工业化社会似乎呼之欲出，这不禁让那些以为没有西方势力的进入中国永远只能停留在传统农业—商业社会的西方中心论者大跌眼睛了：

简言之，在清代，汉口较大的行会越来越多地团体性投资城市不动产并逐步发展了成熟的机制去管理其财政。这一制度体现了马克斯·韦伯及其追随者们所描述的经济“理性”的基本特征：详细的资本账目清算，管理人轮换，得到地方官府保证的契约文书（在形式上有转让契约、买卖凭据以及租赁合同等）。此外，这一制度不仅给投资人提供了赢利的机会，而且建立了一种资本再投资的机制——既在获得新资产方面，也在促使现业主提高其资产价值方面。

当然，这种制度中见不到主要的“现代”因素——工业生产。然而，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行会体制在投资于工业时就不能随之发展成为复杂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第一家现代银行的建立，至少是有一个行会，即茶业公所，发展到了这一步。这家银行的成立，说明通过旧式行会团体的传统商业方式集聚起来的资金，完全可以有合适的渠道成为汉口早期工业化的资本。<sup>5</sup>

### 三、汉口具有初步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

马克斯·韦伯认为，源于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西方城市形成了“城市共同体”，这个城市共同体除了具备防御能力和市场商业功能外，最关键的是城市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市民自治。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机构空间与时间的所谓“公共领域”理论，其要义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在韦伯和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城市共同体和公共领域只在西方存在，“然而在西方以外，从来没有过以一个自治团体(Gemeindeverband)形式存在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中世纪时显见的特征是，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庭，以及在某种范围内有自治的行政组织，中世纪的市民只

有在接受这种法律的管辖，并参与推选行政官吏的条件下，才能算市民。这种带有自治团体意义的城市之所以不见于西方以外的地区，其原因实值得我们深究”。<sup>5</sup>具体到中国先秦及古代中国城市，马克斯·韦伯亦颇为武断地指出：“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市民’与‘城市共同体’的概念。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自治’只是个职业团体及村落的特色，而非城市的”<sup>8</sup>。“韦伯认为，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本身的自然性。在中国，从未形成真正的‘城市’，因为形成‘城市’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城市共同体’从未存在过”。<sup>9</sup>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具有特定的历史时间和文化的独特性，它起源和存在于欧洲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公民社会”独有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言下之意，在欧洲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包含其中。

对于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这些带有明显西方中心论偏见的观点，罗威廉并不认同。关于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罗威廉认为，以“公共领域”理论范畴来分析晚清和民国的中国社会是有理由的，“和西欧一样，中国在16世纪以后出现了长途贸易量的剧增，大型商号、金融机构及有组织的商人网络的兴起；出现了持续的区域城市化进程和一种更独特的城市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茶馆这一形式——酒馆和咖啡馆在中国的对应物）；还有印刷出版业，大众识字，大众文学的扩张，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很重的社会批判意味。”<sup>5</sup>罗威廉以汉口为样本分析中国传统城市中存在着类似于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

其一，汉口存在着市民阶级并具有明显的城市意识：“至于个人身份方面，清代人口的空间流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造成了某些人群地方身份的多元化。首先，在移入汉口的移民中间，依附于出生地的狭隘的乡土观念日渐淡薄；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在那些自称为寓居者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这种现象促进了明确的城市意识的兴起，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阶级（市民）’的出现。……长期居住在汉口的的人们逐步融入到一个内部团结的氛围中，而一些公共自保行动——也促进了城市意识的形成。这样，‘汉口人’的身份也就逐步形成了。虽然韦伯拒绝承认，但事实上，在19世纪中国城市中，不仅形成了城市阶级，也出现了城市社团”。<sup>11</sup>

其二，汉口存在独立于国家与政府的自治组织。罗威廉认为，由于汉口商业发达，导致行业组织——行会大量存在，这些行会不仅管理内部事务和规范贸易行为，而且参与甚至主导城市公共事务。“在19世纪的汉口，引导社会和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地方官府、士绅派系、家族或个别豪强巨头，而是经常在西方著作中称为‘行会’的协会组织。在汉口，行会的势力是显而易见的”。<sup>5</sup>“对于汉口来说，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sup>5</sup>

其三，汉口城市是民间自治而非官僚控制的。“尽管晚清汉口的官僚体系仍然看起来相当强大，但当时的汉口在这一连续统一体中的位置早就靠近自治这一极了。这说明，政治功能的逐步普及化是与经济力量的‘私域化’平行展开的（虽然前者要比后者滞后很多）”。<sup>5</sup>罗威廉系统描述了各类行会尤其是所谓“八大行”参与和主导汉口商业贸易、市场监管、市政建设、慈善公益等方面的情形，“我们对汉口的研究已表明，早在19世纪初，行会及其他民间力量就已经担负起社会协调与社会福利功能，……在传统的与革新性的社会服务两方面，行政机构都把责任都推给了满怀信心、跃跃欲试的当地城市民众和本地经济领导阶层了。汉口官府年年叫嚷的所谓‘冬防’实际上是由民间自行运作的，而它心甘情愿地依赖行会领导的消防与治安系统以在危机时刻维持平安，凡此，都说明官府已经把很多责任推给民间社会力量了”。<sup>5</sup>“八大行控制的汉口完全可以被看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多元化政治制度的治理之下，而不是受到专制主义国家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sup>5</sup>行会在汉口城市经济与社会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大超越了其地域与行业管理职能，已然成为城市准政府组织，这曾经被韦伯等严重低估。对此，罗威廉给予了严厉批评，在汉口“（1）行会关心与控制的领域已远远超出了统辖其所属成员及其行业的范畴；（2）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存在着行会的联合和行业联盟；（3）这些行会联盟逐步采取措施，担负起城市整体利益的责任；（4）所有这一切都得到当地官府的委托与支持。这些认识是否适合于学者们对中华帝国晚期行会之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已有认识？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一直占据西方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心位置的观点——‘商人行会没有足够的力量就其关心的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更不用说在统治秩序方面了’。——其实是不成熟的。同样，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行会的力量‘只包括在具体群体利益的特定问题行使特定（组织的具体权力）’的看法，也严重低估了中国行会组织的作用。”<sup>5</sup>

当然，以19世纪的汉口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城市的市民自治并非欧美的复制版本，而是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走着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自治治理之路。对此，罗威廉强调指出，不能以西方城市为唯一标准来判断和衡量中国传统城市经济与政治发

---

展是否具有“理性化”和“现代化”：“把 19 世纪的中国城市与当代美国城市过分类别显然是愚蠢的，但指责中国城市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市镇共同体所出现的那种特殊的城市自治现象，看来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找到我们认为进步的指标，可能仅仅意味着那些指标只是西方发展道路上的独特指标，或者我们对这些指标所作的界定过于狭隘。同样，我们所界定的‘理性化’或‘现代化’过程也可能只发生在其各自拥有特性的文化情境之中。”<sup>5</sup>循着这一逻辑思路，罗威廉提出了“中国将沿着自身的发展道路，最终发展可与西方相比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胆假设，事实也确乎表明，罗威廉这种假设并非仅仅是假设，19 世纪后期，汉口城市社会早期现代化发展已初现端倪，直至 20 世纪初革命爆发，武汉成为中国乃至亚洲迎来民主共和第一抹曙光的城市：最具决定性的变化进程在 19 世纪的汉口已开始起步。明确的城市意识的兴起，自我觉醒的阶级差别的出现，经济领域中商人集体自治的不断增加，在非经济事务方面商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责任，凡此，却显然有利于在城市领导集团中形成资产阶级。这种初生状态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本质上属于前工业化而且只是受到很少西方影响的环境中诞生的。1911 年，武汉三镇及其他城市里的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站在了支持革命政府的一边。实际上，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在汉口从事纯粹国内贸易和买办贸易的领域，发生了好几起商业活动，都是最初支持建立民国的著名活动。当然，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19、20 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巨变为前提的，但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社会不断变化的结果。<sup>5</sup>

#### 注释：

1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 页。

2 《大清一统志》卷 261 《汉口巡司》，四库全书本。

3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 1 《食货考》，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3 页。

4(5)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1、113 页。

5(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4) (25) (26) (29) (30) (31) (32) (33) (36)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5、10、51—52、382、82、62、102、102、104—105、92、93、17、51、27、91、310—311、333、331、354—355、5、383、285、384、385、378、385、379、384、386—387 页。

6(7)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 页。

7(8)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8(20) (21) (22) (23) (34) (35)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I)，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5、220、222、201、265、220 页。

9(27)《申报》，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10(28)根岸侑：《中国行会研究》(东京,1938),转引自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4 页。

11(37)罗威廉：《近代中国之公共领域》，《近代中国》(英文版)1990 年第 3 期。